

前言

伍连德（1879–1960），一个生死皆于马来亚槟榔屿的海峡华人，却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享有“抗疫斗士”、“中国现代医学之父”等盛誉。与多数新马华人史或中国近现代史上亮眼的华侨¹不同的是，伍连德自从在1910–1911年扑灭了东北大瘟疫后，便致力推动中国医疗及公共卫生的现代化，历任东三省²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总办兼总医官；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铁路总医官；国民政府全国检疫事务处监督等职。在列强环绕、主权尴尬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治瘟疫并非容易的事：其牵涉跨地域交通管制、地方管辖、人口流动管理、民风启蒙、医疗资源调动、与执政高层协商等多重权力运作，在当时积弱的中国毫不简单。伍连德因而处身在一个中西关系互动最敏感紧密、传统与现代对话最迫切激烈的位置。他虽无意于政治，却因科学而被动地靠近政治，与二十世纪初精彩辈出的政治与知识人物相接、相识、相交、相知、相惜。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英属马来亚。满腔热血的社会新鲜人伍连德，在大学毕业便加入振兴马来亚华人社会的行列，积极领导改革风俗、提升民智、鼓吹禁烟等社会运动，结果导致其为英殖民政府视为眼中钉。他在英属马来亚时，与政治的关系相对抽离，在中国时则相对靠近当地政治。这两种局面既可解读为两个极端的互补，又可视为互为表里的因果关系，详其底里将有助了解伍连德其人其思其认同。

¹ 此处的“华侨”沿用王赓武的定义，即指广义的、无所不包的海外华人。有关此词的起源及含义变化，详见王赓武〈“华侨”一词起源诠释〉，[澳]王赓武著，姚楠编译《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页130。

² 即中国东北三省，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又名关东、满洲，俗称东北。

伍连德斯人

伍连德，字星联，出生于槟城一个金匠家庭，父亲伍祺学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下南洋谋生的广东台山人，母亲林彩繁则是第二代侨生。在家中排行第八的伍连德上有三兄四姐，下有两妹一弟。伍连德受教于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³，自十四岁开始，每年都获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颁发的奖励金，并在1896年满十七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领取奖学金前往英国习医。⁴ 在留学英国期间，他也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疾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等处研修热带疾病，获得数名当代生理学及微生物学等领域的权威学者指导，最终在1905年以题为《动物胶中破伤风杆菌芽孢的出现》（“The Occurrence of Tetanus Spores in Gelatin”）的研究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⁵ 回到马来亚，是全世界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在回返英属马来亚之前，伍连德探知亚洲人在殖民地发展机会有限，于是接受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颁发的研究金，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从事热带疫病研究。一年之后自立门户，开设诊所行医，并致力于社会改革活动，力所及处包括：鼓吹女学、剪辮；率先组织文学会社；普及体育；提倡华人社会风俗改革；领导海峡华人公会以捍卫华人权益；创办

³ 这所学校由殖民地政府采纳当地牧师哈钦斯（Rev. R. S. Hutchings）于1815年提出建立一所公立学校的建议而开办，于1816年正式开课。此校校名的“free”并非意指不收学费，而是强调思想与信仰上的自由。这是由于当时殖民地华人家长多担忧孩子进入英校就读将受影响而信仰基督教，从此背弃祖先传统，故该校强调信仰“自由”，以安众人之心。另外，尽管按规定学生每月需缴交为数不多的几元钱学费，但不少贫困学生实际上获免缴全部学杂费。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Ltd., 1959), p. 59; 刘子政编著《黄乃裳与新福州》（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79），页76。槟城最早创办的正式学校是英校，其中大英义学就是槟城第一所英校，其他依次为：圣芳英校（1852年成立）；圣乔治女校（1884年）；英华学校（1892年）。早年槟城各族子弟受英文教育而出人头地者，多出自这四所学府。曾松华〈七十五年来的槟城社会〉，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槟城：槟州华人大会堂，1978），页356。

⁴ 伍连德一共参加了四次英女皇奖学金的选拔考试。第一次是1893年，当时他才十四岁，考获第八名；第二次是1894年，考获第五名，获颁少年奖励金八十元；1895年考获第二名，却因不足岁，未到领取女皇奖学金的年龄，故获颁一百八十元奖励金。直到1896年，他考获第一名；尽管此时他仍然不足龄，但由于没有人的成绩比他更好，所以他便破格获颁英女皇奖学金。Wu, *Plague Fighter*, pp. 155–156. 更多有关英女皇奖学金的设置、条例、发展和获奖者等详情，可见Wu Lien-Teh and Ng Yok-Hing, *The Queen's Scholarships of Malaya, 1885–1948* (Penang: Penang Premier Press, 1949).

⁵ 1903年8月，伍连德自巴黎游学回到伦敦后，便提交了论文，于当月完成论文答辩。由于剑桥大学规定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间必须相隔三年，而伍连德甫于1902年获得硕士学位，所以他到1905年才正式获颁博士学位，唯其早在二十四岁就成了准博士。Wu, *Plague Fighter*, pp. 213–214.

《海峡华人杂志》以议论族群与民族事务；主导禁烟运动；提倡火葬等等，因而被誉为“海峡三杰”⁶之一，唯后来因无意间碰触殖民地政府利益而遭诬陷。1907年，他接受袁世凯礼聘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即副校长），于1908年前往中国就任。

1910年，中国东北爆发十四世纪以来最严重瘟疫，夺走约六万人性命。在群医无策、列强环伺的高度复杂政治社会情势中，临危受命前往调查控制疫情的伍连德，在了解疫区的地理、人口和社会情况之后，以其对西方医学的知识和经验，结合中国政府的配合与中国其他地区西医的协助，适切地采取剖尸、交通管制、隔离、火葬、消毒等系列措施，在短短的四个月内扑灭了这场瘟疫，从而声名鹊起于中国内外，被国际世界公认为权威的“黑死病斗士”⁷。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前身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League of Nations），在1927年授其“鼠疫专家”称号。他在肺鼠疫防治研究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发现旱獭于其中的传播角色，也让他在1935年获提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⁸

其后在中国的近三十年中，他多次防范中国几场瘟疫霍乱，广建现代医院，构设现代化医疗体系及防疫网络，普及公共卫生，并且不间断地研究、游学，发表三百多篇学术论文，编撰医史，参加无数国际医学会议，还创设国际

⁶ “海峡三杰”另外两人是林文庆（1869–1957）和宋旺相（1871–1941）。三人都是女皇奖学金得主，林文庆乃爱丁堡大学医学士，宋旺相则是英国剑桥大学法学士及文学士。身兼医生、企业家、社会改革家、立法议员和教育家的林文庆一生多姿多彩，有关其生平、纪事与思想之传记、专著及单篇文章不胜枚举，包括：严春宝《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交汇与矛盾》（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Khor Eng Hee著，李业霖译注，陈育松补论〈林文庆传〉，魏维贤、许苏我辑编《椰荫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101–151。宋旺相，职为律师，曾参与推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系列新加坡社会改革和教育运动，为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领袖之一，著有史书《新加坡华人百年史》：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1967)。已正式出版的宋旺相研究相对较少，值得参考的有：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1）；另未正式出版的有：Ching Seow-ying, “A King's Chinese: A Study of Song Ong Siang” (BA honour thesis,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73)。

⁷ 这个称之为由来，一方面是由于事隔数年后，中国其他地方又爆发疫疾，伍连德同样被委以重任。有关细节见本书第三章。

⁸ 推荐伍连德提名诺奖的是著名在华美籍医生、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兼格致书院（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即后来的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嘉惠霖（William Warder Cadbury, 1877–1959）；评价人则是后来在1942–1946年担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主席的瑞典病理学家韩森（Folke Henschen, 1881–1977）。“The Nomination Database for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01–1953,” in Nobelprize.org (The Official Web Site of the Nobel Prize),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medicine/nomination.php?action=show&showid=1229> (accessed April 4, 2011).

微生物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等十数种科学学术或专业团体，让国际世界得以了解中国的医药卫生问题，并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医疗卫生水平的评价。这让他不仅为清末以来的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各政权所信任重用，也被社会与国际认同，享有“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之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伍连德退休回返马来亚，在怡保行医，于1960年逝世。

书写多元与专著缺席

至今为止，以伍连德为书写对象的著作——包括学术与非学术类，仍然寥寥可数。其中，最早与最重要的就是伍连德亲笔以英文撰写的自传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瘟疫斗士：一位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⁹。这本在英国出版的传记原本长达六十万字，唯碍于当时的国际情势，在伍连德友人的建议下，最终真正出版的只有五十万字，而没获印刷出版的那些原文已不知所踪。¹⁰ 伍连德自传出版后翌年，徐民谋执笔的中文节译本跟着出版。¹¹ 此书比原著简省许多，但其选译标准不明，至今亦未有学者就此节译本与原著比照研究过，空白处有待填补。而伍连德自传的完整中文翻译本则迟至近年才问世。¹²

1995年，首次以伍连德为专书对象、由伍连德长女伍玉玲（1926–2012）¹³ 编著的纪念画册 *Memories of Dr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伍连德医生的回忆：

⁹ Wu, *Plague Fighter*.

¹⁰ 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黄贤强副教授最早告知此一讯息，以及中国科学院程光胜教授后来提供更多讯息和资料。关于伍连德自传编辑出版的详情，可见马学博〈有关李约瑟编辑《伍连德自传》书稿的史料〉，《中国科技史杂志》卷34，期3（2013）：页379–382。唯此发现重大、饶富参考价值的论文，其言仍不无保留。

¹¹ 伍连德著，徐民谋译《伍连德自传》（新加坡：南洋学会，1960）。此中文节译版封面题为《伍连德自传》，扉页则为《伍连德传》；基于全书之性质，以下皆名之为《伍连德自传》。

¹² 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下册（长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2012）。

¹³ 伍玉玲（Betty Wu Yu-Lin），出生于中国哈尔滨，乃伍连德与第二任妻子李淑贞所生长女。1937年随伍连德回返马来亚后，入读马来亚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美国与台镇华相恋成婚，婚后两人往英国，伍玉玲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继续深造并留校任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于伍连德提议下回返马来亚，协助改革语言学习及教师课程。新加坡建国后，她积极倡导英华双语教学，提倡简化字，主张使用母语，以华语为标准语，协助教育部制定政策与编写教材，开拓新加坡双语教育。1967年，创办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设于新加坡之区域语言中心，执掌该中心达十八年。曾于1973年获公共行政奖章；1982年获长期服务奖状；1989年为太平局绅。晚年热心整理出版伍连德事迹及其遗留资料，除编辑出版这本伍连德照片文集之外，也协助研究或关怀其父历史的学者、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发现其父。

抗疫斗士)¹⁴ 出版。此画册的价值在于集合了许多珍贵照片，是伍玉玲从其父生前收藏，并在离世前移交给她留念保管的三百多幅珍稀照片中加以筛选，配合采辑自其父自传的记录编辑而成，既生动地涵盖了伍连德的一生，成为认识伍连德的最佳入门书，也洋溢着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敬重仰爱。真正以伍连德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最早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本未出版学位论文。¹⁵ 此论文尝试融合伍连德在中国的医卫作为与其在马来亚的社会改革贡献，有全面观照伍连德多重身份的意义。此论文亦为本书的底本。

接着便是2003年沙斯(SARS)之疫引发伍连德重新被中国社会看见后，数年以来在方兴未艾的伍连德热潮中接连出版的几本有关书籍。其中，《国士无双伍连德》¹⁶ 是结合史实与想象的传记体历史小说；¹⁷ 而《发现伍连德：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则是一本综合性文集，收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与新马两地有关伍连德的多篇代表性学术与非学术类论述，以求言说之广度与阅读之普及度为出版动机。¹⁸ 由此可见，真正出版的伍连德学术类研究专书，严格说来尚未出现。

另一方面，发表在各类人物传记、期刊、报章和电子媒体上的有关伍连德之学术与非学术类文章却数量众多。仅以中文文章而言，海外有关伍连德的介绍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出现，但多是人物列传、名人传或社团纪念特刊中的传记文章或简历。它们或罗列铺排伍连德医学方面的作为；¹⁹ 或缀以其青年时代的优异学业成绩，及自英国返回马来亚后(1903-1908)所从事的社

¹⁴ Wu Yu-Lin, *Memories of Dr.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Pte Ltd, 1995).

¹⁵ 陈雪薇《绚丽中一响清凡匿流：伍连德的一生及其思想》，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99。论文指导为黄贤强副教授。

¹⁶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¹⁷ 另外一本受伍连德之重新被发现所触动而写成的小说是：迟子建《白雪乌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但这本以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为背景的小说，书写对象主要是灾区傅家甸之老百姓的生活，并不直接以伍连德为书写对象。

¹⁸ 礼露编《发现伍连德：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¹⁹ 黄尧编《星马华人志》（香港：明鉴出版社，1967），页94-96；邱新民《新加坡先驱人物》（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页253-258。这类文章也出现以英文撰述者，例如 Lee Kam Hing, and Chow Mun Seo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7), pp. 182-183; Bynum, W. F., and Helen Bynum, eds., *Dictionary of Medical Biography*, vol. 5, S-Z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7), pp. 1319-1320.

会改革运动；²⁰ 甚或仅聚焦于当中的禁烟贡献；²¹ 还有少数从医学的角度出发，将抗疫与禁烟归纳为造就伍连德成为不凡医师的实践。²² 唯一例外地将伍连德定位为“社会改革家兼医学家的”，是新近出版的大型东南亚华裔传记中的记述。²³ 唯此类叙述皆点到为止而已。

中国方面，大部分发表在各类期刊杂志的传记体短文，主要是记述伍连德生平及其在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方面的建树。他们或言说伍连德及其著作《中华医史》；或复述伍连德在中国扑灭瘟疫与后继的医卫贡献；或重思伍连德在中国医疗现代化历程中的位置。²⁴ 整个中文世界的报章短文也如雨后天春笋涌现，一时俨然出现集体记忆并书写这个曾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举足轻重却一度被湮没于中国与马来西亚历史视域的人物之风。

有关伍连德的英文学术性文章为数也不少，直至本世纪以来都还陆续出现，虽然数量已大幅减少。但它们多数同样聚焦于伍连德在中国的防疫、医疗与公共卫生现代化事务，其医卫学术研究及著作，或是伍连德的禁烟主张，写作时间上溯自二十世纪初二、三十年间，不乏与伍连德本人直接对话交流之

²⁰ 郑永美〈平章先贤列传〉，《槟州华人大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槟州华人大大会堂，1983），页186；马仑《新马文坛人物扫描》（马来西亚：书辉出版社，1991），页347；刘子政编著《黄乃裳与新福州》，页76–78；黄尧《星马华人志》，页94–96。

²¹ Ong Hean Teik ed., *To Heal the Sick: The Story of Healthcare and Doctors in Penang, 1786 to 2004* (Penang: Pena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Society [PMPS], 2004), pp. 26, 29–33.

²² Ho Tak Ming, *Doctors Extraordinaire* (Ipoh: Perak Academy, 2006), pp. 57–76, 144–160.

²³ Wong Sin Kiong, “Wu Lien-Teh,” in Leo Suryadinata ed., Foreword by Wang Gungwu, *Southeast Asian Personalities of Chinese Descent: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2012), pp. 1296–1299.

²⁴ 马学博、徐维廉等〈伍连德博士——纪念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办《健康报》，1996年1月21日，第3版；吴相湘〈伍连德是中国近代医学的先驱〉，《传记文学》，期2（1984）：页40–54；马伯英〈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的先驱者伍连德〉，《中国科技史料》，期1（1995）：页30–42；冯世鑫、顾金祥、姚元翼〈伍连德：中国卫检的先驱〉，《中国检验检疫》，期12（2002）：页44–45；礼露〈“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海内与海外》，5月及6月号（2005）：页54–57；吴系科〈缅怀我国现代预防医学的先驱者伍连德博士〉，《中华预防医学杂志》，期6（1995）：页323–326；张华〈北京举行“纪念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期3（1999）：页65；青宁生〈中国微生物学先驱——伍连德〉，《微生物学报》，期2（2005）：页317；Sir Philip Manson-Bahr撰，陈明生译〈医学战线上的先驱者——伍连德博士（1879–1960）〉，《中国国境检疫杂志》，期6（1994）：页322、383；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爱国侨胞、防疫泰斗伍连德》（哈尔滨：出版社不详，2006）；程光胜〈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伍连德〉，《中国教育报》，2003年5月16日，第5版；林冠珍〈不该忘记伍连德〉，《随笔》，期6（2006）：页#。篇幅之限，不一一罗列。

作。²⁵ 其中固然可找到相对集中深入的论述，但所言及的伍连德贡献，往往是社会或医学两面其一。²⁶

至于超越伍连德医药卫生贡献而将其作为一般历史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虽然至今数量仍然有限，却是近年来重新阅读与认识伍连德的另一主要推动力与意义生发基点。这类研究成果目前主要仍来自中国以外的学者，并以新加坡为主。²⁷ 总的来说，学术性的伍连德研究或评传尚待开发，研究问题和视角仍有多元化发掘的空间。

²⁵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Health, "China: Plague in Manchuria and North China," *Public Health Reports (1896-1970)* 26, no. 11 (March 17, 1911): pp. 344-345; "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 no. 2641 (August 12, 1911): p. 343; W. P. Y., "Medicine in China,"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 no. 3238 (January 20, 1923): pp. 115-116; N. A. Dyce Sharp, "The Diagnosis of Pneumonic Plagu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 no. 3339 (December 27, 1924): p. 1216; E. V. Cowdry,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Science*, n.s., 65, no. 1676 (February 11, 1927): pp. 150-151; J. F. McClend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n.s., 79, no. 2057 (June 1, 1934): pp. 503-504; "Dr. Wu Lien-Teh,"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 no. 4024 (February 1938): p. 193; Charles A. Kofoid,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by Wu Lien-Teh," *Isis* 23, no. 2 (September 1935): pp. 485-487; Edward H. Hume, "Public Health Progress in China," *The Scientific Monthly* 41, no. 6 (December 1935): pp. 501-504; F. M. Prince and N. E. Wayson, "Survival of the Infection in Fleas or Hibernating Ground Squirrels," *Public Health Reports (1896-1970)* 62, no. 13 (March 28, 1947): pp. 463-467; J. C. A. Dowse,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 no. 5151 (September 26, 1959): p. 552; Carsten Flohr, "The Plague Fighter: Wu Lien-Te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Public Health System," *Annals of Science* 53 (1996): pp. 361-380; Samuel K. Cohn, "The Black Death: End of a Paradig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no. 3 (June 2002): pp. 703-738; Mark Gamsa, "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 *Past and Present*, no. 190 (February 2006): pp. 147-183. 不一一罗列。

²⁶ Ho Tak-Ming, "A Forward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The Family Practitioner* 8, no. 2 (August 1985): pp. 73-79; Ho Tak-Ming, "The Plague Fighter — A Remembrance," *The Family Practitioner* 6, no. 2 (August 1983): pp. 75-84; L.G. Goh, T.M. Ho, and K.H. Phua, "Wisdom and Western Science: The Work of Dr Wu Lien-Teh,"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 no. 1 (January 1987): pp. 99-109.

²⁷ 黄贤强〈活跃于马来亚与中国的医学博士——论伍连德的族国认同〉，张启雄编《时代变局与海外华人的族国认同》（台北：海外华人研究学会，2005），页351-367。此文章探讨伍连德对祖国（中国）与家乡（马来亚）的认同倾向；黄贤强〈来去匆匆：论伍连德在檳城的言行，1908-1937〉，陈剑虹、黄贤强编《檳榔屿与华人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檳城：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2005），页1-14。此文借着讨论伍连德在中国服务三十年间十一次回返檳城参与之活动及其贡献，分析伍氏的文化观、中国观和时代意义；李叔飞〈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华侨华人研究》，期4（2009）：页42-51。此文结合大量理论，尝试厘清伍连德和林文庆之间民族主义观的异同。

重构医卫与社会场域的侨生²⁸ 大医

在马来亚华人历史中，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而享誉国际的土生华人²⁹中，伍连德和辜鸿铭³⁰、林文庆等人一样难以被忽略。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与际遇：都生长于南洋，留学于英国，服务于中国和马来亚，体现了马来亚、英国和中国的历史特点，可谓多元文化交融的典范。不失个别习性专长的他们，在历史叙述中的能见度也不一致。其中，国学素养深厚的辜鸿铭狂放不羁，俨然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中的一阙传奇，广为人知。活跃于政治、社会与文教场域的林文庆，则因出任厦门大学校长期间与反儒家思想者对峙而名声大噪。相对于此，伍连德的经验与人物色彩似乎平淡许多。他虽曾应中国政府之聘而出任“御医”和“总统府医官”等职，但由于从事医学工作之故，

²⁸ 华侨在南洋所生的子弟统称“侨生”。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页44。“海峡侨生”即在海峡殖民地本土出生的华人，即 Strait-born Chinese；而“海峡华人”则最初专指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土生华人，后来也泛指海峡殖民地华人。廖建裕《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回顾与前瞻》，何国忠主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页22-25。本书以“海峡侨生”为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土生华人，以“海峡华人”泛指海峡殖民地华人。

²⁹ 在当今的历史与人类学等学术论述中，“土生华人”（Peranakan）已因其在跨地域、跨语言、跨族群等历史语境中衍生的异质性，导致起源、本义、指涉等驳杂，成为高度复杂而尚无定论的范畴。简言之，“土生华人”乃十五世纪开始在马六甲、新加坡、印尼一带落地生根的华族后裔，初指华族移民与当地土著妇女所生的混血后裔，后来语义延伸，涵盖华族移民与当地通婚所生的后裔。他们兼受马来文化与华人文化影响，男性后裔称为峇峇（Baba），女性则为娘惹（Nyonya）。唯接着又出现“峇峇”的意义范畴扩大为代指“土生华人”的现象。由于亦有学者指出，“侨生”和“土生华人”二词最初在讲华语的华人社会中，侧重的仅仅是以出生地指称华人，并不含任何文化含义。廖建裕《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回顾与前瞻》，页22-25。故本书亦采取此一立场，将“土生华人”理解为在南洋本土出生的华人，乃相对于在中国出生的华人移民“新客”（China-born Chinese）而言。有必要说明，此处不称伍连德为“峇峇”而仅称其为“土生华人”、“侨生”、“海峡侨生”或“海峡华人”，因为根据陈志明的研究，“峇峇”在马来西亚既泛指本土化程度较高的华人，又专指在马六甲和新加坡自我定位为“峇峇”或“伯拉奈干”（Peranakan）的本土化华人。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不应将檳城的峇峇与马六甲甚或新加坡的峇峇相提并论。陈志明《关于被涵化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若干问题》，何国忠主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页37。

³⁰ 即辜汤生（1857-1928），出生于马来亚檳榔屿，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学贯中西，有“清末怪杰”之称，曾留学德国、英国、法国，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学成回返檳城后遇马建忠，受其影响而改变想法，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于1885年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为外文秘书，协助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筹建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1905年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历任外交部侍郎、上海南洋公学监督。辛亥革命后辞去公职，赴日本、台湾讲学，1915年开始，于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译作与著作兼优。政治上信守保皇，癖好清代文化如缠足、长袍、马褂、辫子、娶妾等，为人狂而桀骜不驯。有关辜鸿铭之纪述，可参考黄尧编《星马华人志》，页46-51；或主要研究辜鸿铭的学者黄兴涛之著作《文化怪杰辜鸿铭》（北京：中华书局，1995）、《闲话辜鸿铭：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他一向过着规律自制的生活，踏实而无大起大落，即使离华返马后，晚年仍继续行医、做慈善、参与社会活动等。然而，相对缺乏戏剧性升降的人生历程与经验，不应淡化伍连德在历史中的可见度。在马来亚华人社会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当今方兴未艾的中国医疗史中，具有多重经验的伍连德，值得从其在不同时空中的经验及表述，加以多向度地观照研究。

1903年，伍连德在英国、德国、法国完成热带疾病的考察研究和论文写作，带着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准博士学位回返马来亚。从英国乘搭轮船途经新加坡时，他在林文庆处逗留了两周。这短暂的旅新经验有其重要意义，因为受过高等医学专业教育的伍连德在林文庆的精神感召之下，凭其自身在英欧现代文明发展最迅烈的时代社会浸濡与接受教育的经验，加上独立的思考能力，以及对族群社会的关怀，马上敏锐地察觉到当时新马华人社会的弊端与不得不改革的迫切性，从此立志投身于社会改良志业，并在后来有所作为。³¹

在伍连德的马来亚经验中，殖民地统治那介于封闭与开放之间的政治社会体系，连同十九世纪新马华人社会的结构，既共同给伍连德带来机遇与挑战、吸力与推力，也让伍连德在新马华人历史中显得不同。殖民地统治以肤色、种族作为人员任用的范畴，对持女皇奖学金而在英国最高学府医学系与首善之都伦敦留学生生活归来的伍连德而言，无异于一种欲迎还拒的姿态。在这种平等待遇缺失的政治社会氛围中，一个不从商不涉足政治、尚未建立雄厚社会资本的亚裔新知识分子想要有所为，其最初面对的不得其门而入与不公平感并不难理解。³² 加上他后来由于领导社会改革而直面殖民地政府的种族政策和经济收益，并间接冲击华社部分利益既得者，种种发展似乎顿时让伍连德陷入风声鹤唳、孤立无援的情境中。当此时，袁世凯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一职的邀聘显得及时不过。数年前因缘际会种下的结果，却俨然一种故土的亲切

³¹ 伍连德和林文庆的交往值得探究，毕竟不仅后来林、伍两人成了姻亲，林文庆之妻黄端琼 (Margaret Huang) 与伍连德之妻黄淑琼 (Ruth Huang, 1884–1937) 为姐妹，林、伍两人都是“新福州之父”黄乃裳的女婿，而且，林、伍两人的社会改良活动分别立足于南方新加坡与北方槟城开展，致使这两位同样参与海峡殖民地与中国社会的改良者，于公于私都有关联。伍连德的婚姻将在本书第三章提及，此不赘。

³² 在南洋华人社会，富商为华人民间社会领袖、沟通政府与民间的桥梁，己为共识。举例来说，杨进发在其研究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领导层的文章中提及，当时华社十五位最有分量的领导人中，除了林文庆和宋旺相之外，其余全为商人。Yong Ching Fatt, “Chinese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Hsin-she Hsueh-pao* 1, no. 1 (1967): pp. 4–5.

召唤，促使才识兼具却深感不获知遇的伍连德于1908年，毅然携家前往一个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的大陆。³³

在二十世纪初选择从海外到中国发展，这种关涉历史社会文化的经验与转折如何影响或反映了伍连德的认同与人生选择，值得从更细致与实际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重思，而非笼统地以“爱国”、“回国”等字眼冠之，将伍连德所代表的一代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与中国之关系互动简化归纳。因为毕竟伍连德的中国经验，正是启始于其马来亚经验的低潮时期的。对于其发展医学专业的考量，正是本书在剖析伍连德时会纳入检视的重要范畴之一。

在医疗卫生专业和社会改革方面的经验成就之外，伍连德私底下的生活并不单调乏味，广泛的兴趣和交友让他展现有别于医学家的人文形象，也间接促使他得以不同方式落实社会关怀。他喜爱阅读与收藏书籍，涉猎的范围包括专业用书、中国古医书、哲学、历史、文化等书籍。为了提倡阅读，他在晚年不仅把藏书捐赠给新加坡大学，并自动自发、亲力亲为地筹组了霹雳公共图书馆。另外，在中国期间，伍连德也养成了收集古董的兴趣。这一是由于他在当地的朋友中不乏古董收藏家，间接提升了他的鉴赏古董的能力；二则地缘关系，古玩甚多，为他提供了许多接触古董的机会；三则是当时他的收入颇有余裕，得以负担这项嗜好。同样到了晚年，伍连德将其收藏的古董都捐赠出去，部分名画由马来亚大学博物馆收受。

而且，处事认真严谨的伍连德喜爱写作，待人至情至义。平时他总会不时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可谓为其晚年写作回忆录奠定了极好基础。³⁴ 另外，由于感念英国剑桥大学及圣玛丽医院的栽培之恩，他到晚年仍不忘率先捐助皇家亚洲学会在上海修建会所，以推动中西文化理解交流。可以说，伍连德不仅以其应用医学及学术研究的杰出成就沟通东、西，还从社会与知识面致力倡导东西方文化的互通。而且即使回到马来亚之后，洗尽铅华的他都不曾放弃改良族群、社会甚至民族的愿景，积极地参与扶轮社，发表对火葬、长寿、异族通婚和国民权利等看法，继续借由各种慈善公益和国事评论等工作，实践其社会关怀。

如此种种，都可见出医者伍连德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道一面，其对文化学术的支持，以及他重视人文知识之于人与社会的作用，也可明了他协助推动东西

³³ 有关伍连德到中国的多方面原因，可见黄贤强〈活跃于马来亚与中国的医学博士〉，页351-367。

³⁴ 伍玉玲，笔者访问，1999年8月28日，于其荷兰路附近之住家。

方文化交流背后的开放眼光。对于如此一个对科学和人文社会皆有所经验和积累的海峡侨生医学博士，理应就其进行一种相对周遍而不流于片面的观察、研究，甚至书写。

事实却是，这位终其一生都投身于医疗卫生及社会改革事业，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南洋与中国的海峡侨生，自其逝世不久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缺席于新马与中国的集体记忆中。直至2003年沙斯病毒在中国爆发并席卷亚洲，这个曾经早在二十世纪第十年就已于中国东北成功地扑灭一场夺命数万的传染病，从而开启中国医疗卫生现代化进程的人物，才又被中国媒体发掘出来，并重新传入新马地区。如今，中国方面对伍连德的认识、重视和书写程度当数最高，伍连德纪念馆、伍连德纪念医院、伍连德小学、伍连德公园，都已陆续在哈尔滨伍连德工作过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原址或附近被保留、命名或改建而成，以资纪念。然而，出于地域的关联，伍连德为当今中国所记忆的，不可避免的仍集中于其医者实践。

如此连带影响的，是伍连德在新马华人历史叙述与集体记忆中同样的缺乏周遍观照。即使怡保有条街道以伍连德命名，槟城也有个住宅区称伍连德花园（Taman Wu Lien-Teh），伍连德铜像也新近入驻槟城，但长久以来伍连德都被忽略于研究论述中。且勿论多部早年出版的人物志或列传彻底地将伍连德遗忘，³⁵ 即使在一些有记载伍连德的名人传记之短文中，他也仅被定位为医生或科学家，而且大部分的叙述流于简略，缺乏对这个跨越南洋与中国、医学与社会的多重空间疆域之海峡侨生，给予系统化的研究，³⁶ 更罔论将这一人物置于其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中，从其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所属群体的共同性，探析其医学与社会改革功绩背后的认同与思想。

³⁵ 许教正《东南亚人物志》（新加坡：新生有限公司，1965）；陈维龙《东南亚华裔人物传略》（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华侨协会总会（台湾）编撰《华侨名人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1984）。这几本著述皆无提及伍连德，其中尤令人不解的，是陈维龙实为伍连德的友人。而且，伍连德在为自传编制索引时，曾为了解中国过去和现代的应用汉语而向陈维龙请教过，之后也在自传序言向这位总是有求必应的朋友致谢。Wu, *Plague Fighter*, p. viii.

³⁶ 这也许是由于许多撰写十九纪华人名人传记的作者，都根据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之故：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他们较少采用旧日报章、民间档案等文献，而宋旺相一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又局限于英文档案和西文报章，很少引用中文报纸。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页166；梁元生〈前言〉，《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页v。换言之，以《槟城新报》为例，此报由于地缘关系而报导了许多有关伍连德的事迹，凡伍连德参与的重大改革事件几乎皆可见于该报，可作为观察伍连德在槟州社会地位的依据，但这一重要资料，往往为大部分过往的传记编撰者或著史者忽略了，间接影响伍连德在新马华人历史叙述或人物传记中的能见度。

总言之，一个在中国享有“中国现代医学之父”美誉的医疗卫生专家，他在南洋出生、成长和接受英文教育，又曾在英欧接受最前端最完整的医学教育与训练，之后活跃于马来亚的社会改良活动与中国的医疗卫生现代化事业。其文化与知识背景多元，其历程经验则与其所处的十九世纪英属马来亚和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进程充满对话空间。因此，除了其广为人知的功绩之外，这一介知识分子在其时代之所思、所感、所忠、所向与所选择，则同样不失趣味、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这正是本书研究动机所在，也是本研究问题提出的基础，说明本书为何试图放置伍连德于重构的历史语境中，论析其在医疗卫生现代化和社会改良这两个场域的经验背后之认同、思想与表述。

关于本书

一般认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华人群体所彰显的特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都体现了一定的时代性格。这些时代个性的本质相近，唯因各地政治情势和社会条件，而在表现程度上略有差异而已。本书既以研究伍连德的经验、认同为意图之一，便需将其置于十九世纪英属马来亚这一时空中，观察分析这一个体如何在其所处历史语境中建构种种认同、选择。而大体来说，十九世纪以来，新马甚或东南亚华人受四大面向的议题关联甚重，其中包括了：华人和“祖国”的关系；华人的文化和教育问题；华人在当地扮演的政治经济角色；华人归化当地国的问题。³⁷ 本书在探索伍连德经验背后的思想认同同时，亦不免从这几方面切入，重构当时马来亚华人的境况，分析伍连德于其中的位置处境，以厘清其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如此结合伍连德的经验和他所处时代社会的华人主要关切面向，促使本书试图回答许多具体的问题。例如：伍连德之所以留学英国、短暂逗留马来亚、服务中国与终老于出生地，是不同时局中自主性靠拢的姿态或被动的选择？当中，他对英政府、英殖民政权、本土社会和中国的观感，相对于其时英属马来亚华人群体而言，如何彰显了共性和个别性？其行为实践和自传书写，如何表述了他对事业考量、民族主义思潮腾升亚洲，以及东西方政治文化势力在英属马来亚和中国角力的历史经验？另外，侧重商、政、教的新马华人历史论述一

³⁷ 杨建成〈试拟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的四个中心问题〉，宋哲美《香港东南亚研究所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90），页21。

度遗忘伍连德，这固然和伍连德本身趋淡低调的个性不无关系，但这一历史人物的外在与内在，究竟如何地矛盾冲突或交融互补？

这连串的问题，都可归纳于身份与思想、经验与认同这几大范畴之下，也见于伍连德的书写表述之中，由此形成了本书的问题意识，即伍连德的经验如何透露了其身份认同？且这种对其身份认同的认识，又如何映证于其书写？这不仅汇聚成本研究主题所向及内容的结构逻辑，也正是本书书名标志从“经验、认同、书写”三大视角，研究并论析伍连德的思路所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伍连德在晚年费了七年功夫，亲笔以英文著述的洋洋洒洒五十万言自传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瘟疫斗士：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无疑是本书最为倚重的研究资料。该自传共二十四章，插图二十二帧，图文并茂地忠实记录了伍连德的一生，全书于其逝世前一年（1959年）正式出版。³⁸ 但是，为了也能相对客观地了解伍连德在其时代如何为地方社群所认知与接受，仅凭其自传是不足够也不适切的。因此，昔日的报章报道也成了本书另一重要的参考资料。³⁹ 基于伍连德生长时空之考量，本书所参考的华文报章，最主要是陈新政和吴世荣于1895年在檳城创办的《檳城新报》（1895–1941）⁴⁰。唯由于独立前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关系密切，新马历史研究者素来博览两地材料，故本书也从《叻报》、《天南

³⁸ 这本自传开章明义便以四章的篇幅叙述伍连德对抗黑死病的经验，巨细靡遗地勾勒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的病源、治疗、预防到研究等细节，凸现了伍连德以防疫专家著称于世的历史身份，也使得此书具备中国公共卫生发展史及抗疫史的重要参考价值，却又因包含其个人经历而不致流于一般医学报告般单调沉闷。

³⁹ 早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马华人历史学家如颜清湟、杨进发与林孝胜等人，便大量结合档案数据、旧报章、史书、碑铭等史料，进行深入的科学化研究，将新马华人社会史研究导入新方向。马来亚最早的英文报分别为 *Singapore Chronicle*（1824–1837，新加坡纪事报）、*Singapore Free Press*（1835–1962，新加坡自由西报）、*The Straits Times*（1845–，海峡时报）等。这些报章除少数缺期外，绝大多数保存至今，唯本书主要参考 *The Straits Times*。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所收之缩微胶片有些缺期，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所藏最为完整，为本书兼采。华文报方面，1845年创办的《地方之报》（*Local News*）和1858年的《日升报》这两份早期华文报已散佚，无法借以了解十九世纪华人社会，故一般新马华人史研究借重《叻报》（1887–1932），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星报》（1890–1898）、《檳城新报》（1895–1941）、《日新报》（1899–1901）、《天南新报》（1898–1905）、《总汇新报》（1908–1946）等。换言之，探讨早期新马华人社会，基于现存华文报章之限，需同时兼采英文报章资料。英文报章虽着重报导当时政府之政策，唯也不乏教育、经济、社会之史料。庄钦永，《新呷华人史考》，页173–175。本书对于旧报章之选用除主要以地域和时间之相关性为考量之外，也不外于这一研究传统。

⁴⁰ 郑民、梁初鸿、李竞、陆宏基、赵林、丘立本等编《华侨华人史书刊目录》（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页174。

新报》、《南洋商报》、*The Straits Times*, *Malaya Tribune*, *Straits Echo* 等报章，乃至香港的《星岛晚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中，搜寻有关伍连德的报道或其著述，以便广泛地了解伍连德在中文与英文使用社群中的接受度。再来则是少部分伍连德的信件，以一察晚期伍连德与中国的关系。

另外，由于伍连德生长的时空及其身份遭遇使然，度藏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海峡殖民地档案》缩微胶片，其上限是1784年，下限是1940年，⁴¹ 也有助于本研究厘清殖民一方对于伍连德及其所代表阶层、社群的言说与观感。

此处稍微说明在搜集伍连德的相关资料时，如何遭遇其名字的英文拼音所带来的挑战，此亦研究新马历史者常注意到的现象之一。原来在普通话及汉语拼音尚未通行于新马地区时，一个华人的名字常有几种按不同方言发音的读法，致使其对应的英文拼音多样而难以辨认。伍连德之名的原意，是五种联合统一的德性，粤语拼音为 Ng Lean-Tuck；当时官话（即普通话）的发音为 Wu Lien-Teh。但后来他入学前到大英义学注册时，该主事的书记却凭其本身福建人的习惯发音，将伍连德的名字拼写为 Gnoh Lean-Teik。那名书记后来为了补偿错误，遂答应伍连德除了保留姓氏 Gnoh 之外，他的名字将改拼为 Lean-Tuck。如此这般，由于这名书记的关系，伍连德从此就成了 Gnoh Lean Tuck，这也是伍连德在大英义学、剑桥大学、伦敦医院等学业记录和医业注册中使用的名字。留学英国时，由于西方人习惯将姓氏置后，因此伍连德的英国与欧洲友人都仅称伍连德为“德”（Tuck）或“德先生”（Mr. Tuck）。伍连德从英国学成返马后，仍然沿用其在学校的这个名字。因此，今所见旧日（主要指二十世纪初）英文报章上有关伍连德从事社会改革运动的报道，概以 Gnoh Lean-Tuck 见称。直至1908年伍连德到中国天津陆军军医学堂服务时，为了沟通的便利，伍连德才将其名按官话发音拼写为 Wu Lien-Teh，并从此被普遍使用。⁴² 由于这曲折的过程，致使现存的文献资料中，常交错出现 Gnoh Lean-Tuck 或 Wu Lien-Teh 两个拼音名字的现象。这段渊源使得本研究的资料收集工作须格外留神。

总的而言，本书参考的主要资料，包括了伍连德的亲笔自传和其发表在新马报章上有关社会改革的文章，少部分其后期的言论与信件，其次则是昔日报

⁴¹ 庄钦永《新呷华人史考》，页167。

⁴² Wu, *Plague Fighter*, p. 149.

章的报道，并辅以其女伍玉玲的口述历史，及官方或伍连德参与过的社团之档案。在考察的视野方面，由于伍连德生长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马殖民地社会，华人仍多以中国为原乡，他们一方面心怀“祖国”，一方面又有立足本土社会的现实诉求；许多人既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影响，心态上交织着眷恋原乡和落地生根的矛盾纠葛，于实践中便体现了难以言喻的中国情结和恨铁不成钢的改良愿景。⁴³ 要评析这种历史处境中的伍连德之所经验、所思、所认同，便不免要从宏观联系比较和微观聚焦细读的交互视野和方法出发，既全图景式地考量当时南洋、中国、英国的政治局势与伍连德在群体社会中的位置，又集中于伍连德的自传与评论等书写，厘清其如何表述其对经验与历史的看法，彰显其种种实践背后的思想与认同。

根据英国文化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所谓身份认同是种高度流动而非静止的概念。因此，认同的界定与身份意识的演变，仰赖的并非追本溯源，而是胥视个体如何面对自身或群体所经历过的道路。那种省思发为文字，便成了自我表述。⁴⁴ 所以，如何看待往事，如何置身其中，都是个体表述认同的重要方式。⁴⁵ 换言之，经验与认同往往是表里关系，而书写则是这种关系的表述。这也就是本书理路与架构的依据所在，也再次合理化本书希望通过厘析伍连德的经验和书写，深化对其认同之认识的意图。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共五章，并以一个代结语作结。第一篇的伍连德评传，将伍连德的一生经验分为三个阶段述评。第一阶段为青少年时期伍连德在南洋和欧洲的成长与教育游学经验，本书笔墨将聚焦于评述出身工匠人家的这一槟城土生华人子弟，如何凭自律获得女皇奖学金，然后在社会达尔文风气盛行欧洲之际留学英伦，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接着，成为社会新鲜人的伍连德回到马来亚，于1903–1908年这五年一跃而为社会改革领导分子。这第二阶段的伍连德，经验了他这一土生华人精英与殖民地政权及部分华人领袖最为密切又暗流汹涌的接触，对其马来亚认同的影响深重。第三阶段则述评伍连德1908年7月前往中国后，如何从沉潜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到临危受命投身抗疫而扬名

⁴³ 这课题广为新马华人史研究者所论及，诸如颜清煌、王赓武、李元瑾等人之多种著作皆曾或详或略提及，本论文第四章亦将就此论析伍连德之认同，此不赘。

⁴⁴ Stuart Hall,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6), p. 4.

⁴⁵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p. 222–223.

世界，接着大规模兴办医院、普及医疗卫生等工作达三十年的历程。这一阶段也涉及1937年重归马来亚后的伍连德，阐释其如何在个人历练心境和外在政治社会氛围都有异于三十年前的同一空间中，继续其行医、行善、演讲和撰文议论民风的改良人生。这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重点不在于述，而是尝试就伍连德的足迹与实践，分析其经验于当时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共性与个别性。

第二篇的专题分析伍连德，则主要从两篇专题文章论析伍连德的思想与认同。其中的第一章（即全书的第四章），主要以伍连德在社会和医疗方面的改革成就，辅以其待人处事的冲泰温和为焦点，剖析如此一个海峡侨生医疗卫生学家在英属殖民地、中国和马来亚本土社会等三个不同语境中的身份表述。第五章聚焦伍连德的自传书写与出版情况，以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对历史环境的考量，不仅局部归纳出五个伍连德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络，再现了其和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知识群体的交游，也尝试分析伍连德的书写如何表述了其对于记忆、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识群体、功业乃至个人的看法。最后一章是代结语，其中第一小节乃伍连德自传的评论，乃进一步承续第五章对伍连德书写的论析，集中分析伍连德自传的物质文本呈现，其中又以其结构与内容为焦点，分析在现代传记研究的视野之下，伍连德自传的价值。代结语的另一小节，则简单总结本书的见与不见，指出未来有待开展的伍连德研究展望。

时至今日，有关伍连德的书写已不在少数，但至今仍不见意图具体、系统及周遍地论述、评析与研究伍连德在社会改革与医疗卫生现代化这两大场域的实践之专著，而这正是本书试图努力的方向之一。本书第一篇以时序方式就伍连德的生平经验开展的论述，乃尝试以评析填补空白，发一些现今多种包括出自伍连德之手、他人翻译或文学杜撰的伍连德“传”所未触的、关乎伍连德一生经验的议论，是为“评”“传”的意义所在。接着，第二篇中的两章和代结语的第一节，乃进一步深入对伍连德之研究，而其所采取的进路，则大体是先论析伍连德经验所表露的身份、政治与文化等认同，进而研读其介于抽象与有形之间的书写行为，然后再具体地解读评论其回忆录这一物质书写成果。简言之，第二篇和代结语乃直扣着伍连德的经验、认同与书写进行总结性的评价分析。希望借由这上下两篇的内容与结构，能不失说服力地再现伍连德的外在经验；同时还借着解读介于经验与认同这两种具体实践和抽象思维之间的自传书写——一种记忆表述的行为实践及物质文本本身，拓深对伍连德主张、思想为人、认同及其对本土、原乡与殖民之观感的认识。